

中国乡村女教师代际研究

武晓伟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广东珠海 519085)

摘要: 本文以中国从建国至今的社会变迁为大背景,采用不同代际乡村女教师的口述史资料,试图勾勒出建国以来几代乡村女教师的来源、身份、社会功能,以及她们与村落和社会的关系。共和国使命主导教育实践,教师原本是乡村文化和家庭地位相对优越的男性所从事的职业,然而由于国家建设的需要,女性登上历史舞台,从第一代乡村女教师到第五代乡村女教师她们的命运与共和国息息相关。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近年来城镇化的进程改变了她们的身份和功能,也改变了她们与家庭、村落的组织关系,更加影响了她们的精神生活和对自身以及乡村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 乡村;教育;女教师;身份;社会变迁

中图分类号: G6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733X(2016)03-0128-09

DOI: 10.16614/j.cnki.issn1001-733x.2016.03.016

A Study on the Generation of Chinese Rural Female Teachers in Social Transition

WU Xiao-wei

(Zhuhai Campus,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Zhuhai 519085,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social change of China, and uses the oral history data of different generations of female teachers in rural area, we attempt to discuss the recourse of female rural teachers, their identity, social func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eachers and rural community. The country leads the educational practices, the teacher was originally a profession by men, however the national construction need the women, so the female teachers emerged, from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rural female teachers to five, their lives are different and were deeply affected by the social transition.

Key words: country; education; female teachers; identity; social transition

一、背景与方法

乡村女教师是我国乡村教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她们却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历史过程。早在新式学堂产生之前,我国教育具有强精英性质,乡村塾师除了教书育人之外还广泛参与本地日常事务,在乡野具有很高威望并受到乡民尊重。塾师一直是一个男性所把持的行业,作为一个乡村社会的高位阶人群,具有广泛的文化符号象征意义。由于旧时代女性被排除在科举之外,因而,女性也无法成为塾师。

新中国成立以后,从形式上,新中国完全取缔了私塾的存在而统一入学机构为“学校”,传统意义上的塾师也随之一并被抹去,经过民国时期的逐步蚕食和新中国多次政治运动的洗礼,传统塾师的文化符号意义日渐淡化,教师不再只是男性从事的职业,不少乡村知识女性也开始进入教师行业。然而,根据建国后至60年代初的统计数据,全国分城乡普通中学和小学中男教师比例均高达80%以上^[1],特别是乡村,在这一时期男教师仍旧占据绝大多数。

收稿日期: 2016-04-20

作者简介: 武晓伟(1981-),河北张家口人,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教育学院讲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研究方向:教育社会学、农村教育、社会性别研究。

2016年第3期(总第200期)

随着工业化运动引起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和普及教育的扩展,尤其是高考扩招师范教育录取比例增大、门槛降低,吸引了大量的乡村女生,她们毕业后多数担任教师一职,造成教师来源上女性比例的上升。

本文将以新中国建立后至今不同年代典型的乡村女教师群体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乡村女教师代际更迭的研究,试图探寻女性与国家、村落间通过“教育”这一中介因素所展现出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揭示出在中国特色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教育和乡村教师如何在社会最末端联动着社变革的主旋律。

本研究对于乡村女教师代际的划分主要采取将时间节点与重大事件相结合的方法,从建国至今六十余年,根据国家建成的历史进程来看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949年至上世纪80年代前后,即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第二个阶段从上世纪80年代前后至今,即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经济飞速发展时期。在这两个大的阶段中,结合我国乡村女教师自然年龄要素与典型教师群体,又划分为2~3个小阶段。本文将讨论五代乡村女教师,对她们研究,主要关注以下问题:第一,乡村女教师来源、身份与其精神特质;第二,乡村女教师与国家、村落社会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第三,不同代际的乡村女教师职业生涯发展状况及其制约因素。

本研究主要采用口述史和个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口述史可以打破单纯以文字资料为资源的规范,让“事件”的参与者直接与历史进行对话,不仅可以弥补文献资料的不足,还可以使历史展现出有血有肉的“人”的特征。特别是对于乡村女教师这个群体,她们身上既有职业女性的特征,同时又带有鲜明的乡村妇女特征^[2]。由于受传统社会文化的影响,乡村女教师较为保守、被动,较少参政议政,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意识也相对薄弱,大多数仍囿于家庭之中,作为感受者甚至是旁观者存在于学校边缘,而性别制度又对女教师加以规训,使其成为失语和失声的群体。对这个群体的研究,采用

质性研究方法可以深入展现乡村女教师个人生命故事,将其生命历程融入时代和社会环境之中,更能够揭示乡村女教师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复杂联系。

本研究中乡村女教师主要是指在县城及以下乡镇和村小、教学点任教的专职女性教师,更为典型的乡村女教师是指在乡镇和乡镇以下学校(主要是小学)工作的女教师^[3]。笔者与研究团队近年来一直从事乡村教师口述历史的收集、整理及研究工作,本研究的口述资料主要来自2012至今笔者在贵州、河北两省做相关调研时积累的一手资料。

二、第一代乡村女教师:新身份的探寻与认同

现代国家使命主导教育实践。教师,原本是乡村文化和家庭地位相对优越的男性所从事的职业,然而,国家政权建设之初,政权并不十分稳定,需要巩固和稳定政权,妇女成为重要因素。这一时期对基层妇女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以提高其作为劳动者和新中国建设者的女性人口的觉悟和素质,成为稳固政权的要旨之一。通过国家政权涵义的强化使女性意识到自身“独立”与“解放”与国家建构密不可分^[4]。此时,执政党一方面利用普及教育的方式提高乡村学龄女童入学率,减少与消除新女性文盲;另一方面也积极促进成年女性入学,并通过估计乡村知识女性走向教师,甚至干部岗位,以起到“榜样示范”作用^[5]。

笔者在2012年11月赴贵州省访谈了西江苗寨的一位苗族女教师龙某英,她85岁高龄,是当地建国后第一批女教师。据龙老师称:

当时不要说女教师,女娃娃出来念书的都特别少,政府为了鼓励女娃娃出来读书,就让我去做工作。情况经常是这样的,我老是不停调(工作),当我调到一个新的学校时,那个学校的老师们都高兴得不得了,都说“来了个苗家的女教师太好了,这里还没有女老师呢!”学校里有了女教师,村民们才敢让女娃娃们去上学。

2014年8月,笔者在河北省青龙县访谈到一位82岁女教师高某珍,她是当地建国后第一代乡村女教师,在她近30年的教学生涯中,曾在早年频繁调动,总共在12个村的村小担任过教师,高老师对当年的情况描述道:

那时候没有女老师,各个村都缺,虽然鼓励女孩念书,但在农村这么多年传统的“男尊女卑”的想法,一时间根本不能完全改,村长做动员去了,他就把他家的女儿送去(学校),人一走他又把女儿领回家下地干活,很多这种情况,而且有些村民们说学校里都是男老师,女娃不敢去,怕挨打。所以,那时遇见女教师是很难得的。政府出钱把我们培养出来,总是要我们发挥带头作用的,所以这么频繁地把我们往各村调,就是想让村民们看看,女孩子读书了,有出息了,拿公家钱,能当老师,多了不起!

乡村女教师这种“榜样示范”作用,同时也体现在建国初年的乡村成年妇女扫盲运动中,她们可以说是“儿童教育”与“成人教育”双肩挑,为国家脱盲战略目标的实现起到了关键作用,成就了一支稳定、廉价而且积极投入的乡村教师队伍。

笔者在河北省青龙县访谈到四位年逾八旬的第一代乡村教师,她们都曾参加过当地的扫盲教育,据这四位女教师反映,成人扫盲班几乎全部都在下午或者晚上,白天正常在学校上课,晚上被安排到不同的地方组织村里成年男女进行识字扫盲的工作。在这些成人扫盲教育中,女教师承担了大量的基础性教学工作,她们比男性教师更耐心和投入。以下是其中一位杨某琴老师的讲述:

我那时当校长,最清楚扫盲这个事了。先是县里办妇女扫盲班,把有文化的女老师全都招过去,给分配任务:你负责几个村,她负责几个村。那会儿女老师少,我们的工作量大,特别大,比男老师还辛苦。白天上课,下课了扒拉(仓促地吃)两口饭,赶紧又拿着书到指定的学校里上夜课(成人扫盲课)。我两个儿子小,晚上扔给邻居帮忙看着。有一次我回来晚,大儿子

就自己睡着了,结果冬天的火炕把衣服给烧着了,差点要了命!农村妇女文盲的特别多,所以扫盲的任务妇女就是重点,我们女教师过去教,她有说服力,也有耐心。就我知道的情况,我们学校派下去的男老师参加扫盲工作,有的不上心,白天一下班先回自己家的地里干活儿去了,你可得催呢,催上三四遍才去。那个时候扫盲是没有啥多余的报酬的,我在安排学校女教师时,考虑哪里的妇女文盲多就让她们去哪儿,有的学校离她们自己住的地方可远了,人家一点怨言都没有,丈夫孩子一扔,拿起课本就走了。后来我们妇女扫盲班里又培养干部,继续做工作,她们结业了再去培训别人。我是觉得这些妇女个个都是好样的,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态度特别认真,服从上级安排,肯吃苦肯学习。

在笔者访谈第一代乡村女教师的过程中,发现她们高负荷的工作,以及她们较低的收入、来自家庭的羁绊和自身能力的不足是她们对这一阶段工作的一些比较一致的说法。其中“累”和“苦”是在对第一代乡村女教师访谈时出现频率最高的词。

三、第二代乡村女教师:激变与民办教师身份之殇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由于国家政策的偏差,不顾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实施“大跃进”,导致乡村办学的热潮,公办教师严重不足,民办教师登上历史舞台,这也是第二代乡村女教师面临的身份之痛。

以笔者调查的青龙县为例,1957—1960年四年间,该县教育全面进入“大跃进”,学校猛增,至1960年,小学发展到699所,学生69032人,教师增至2052人,中学发展到14所,学生5563人,教师共计349人。而这其中为了弥补公办教师的不足,QL县始招收民办教师,至1960年,该县共有民办教师(含中小学)由7名激增到441名。据青龙县一位74岁男教师张某龙称:

(19)58年起遇上学高峰,光我们乡(10个

行政村 50 余个自然村) 小学校就十几所, 好几个村像官场、下杖子、谢杖子、温杖子等村, 还有社办农中。有的村特别小, 但也办(小学)。那会儿几乎是队队建小学, 社社办农中(农业中学), 老师可缺啊, 公办(教师) 没那么多根本不够分的, 就只好招民办、代课(教师), 队里给工分。

“大跃进”本身并非仅仅经济发展的竞赛, 而是一场政治运动。在乡村, 一切学校除了在自己的农场进行生产, 还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参加劳动合同, 并且派教师住到合作社去。据笔者访谈的一位张姓女教师(75岁)称:

那时当老师可忒艰苦! 白天上课, 下午了或者到了节假日还要带着学生搞生产, 勤工俭学。我那会儿在七道河乡四道河村, 大队给我们圈了一座山在学校背后, 每天中午吃了饭, 我就带着学生去割草、打芦柴、搬松塔, 孩子们年纪小, 只能搞这些, 高年级了就砸石头。男老师女老师都一样, 都得劳动。这一天(班) 上下下来, 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

过度的生产劳动, 不仅严重地冲击了正常的教学秩序, 而且对于生理条件弱于男性的乡村女教师, 这种高强度的劳动无疑更是加重了她们身体和心理的负担。男性教师除了正常教学和参加校内劳动之外, 仍有余力继续下地挣“工分”, 因此, 与男性教师相比, 乡村女教师的收入只有其一半, 甚至不足一半便可以理解了。

另外, 乡村学校的“大跃进”, 使得民办女教师的增幅明显高于男性。在国家政权得以调整, 纠偏整顿时期, 民办女教师的人数又迅速下滑, 下浮比例也远远高于男教师。以河北青龙县为例, 1961年后, 全县学校实施精简合并调整过程中, 民办女教师下降幅度非常大, 其教师身份也最容易被剥夺。当地一位民办女教师杨某芝(75岁)的话就证实了笔者这一观点:

上世纪60年代初大整顿, 我们村子本来就小, 学生也不多, 上面就让(我们村的学校) 跟隔壁村的合并, 合并后老师就多出来了, 队里来人找我谈, 说要合并小学校, 咱村的娃娃少。学

校当时就俩老师, 把我刷下来了, 另外那个男的(公办教师) 留下了, 跟着学生一块儿并校去了。人家是命好。咱是女的, 又是个民办临时的, 不顶事, 咋也轮不上咱。

这说明, 乡村女教师身份的获得和剥夺均是来自政权建设的需要^[6]。女性在整个过程中, 扮演着一个为国家服务的沉默而顺服的“生利者”, 她们在历史舞台上的登场和退出, 大多并非她们本意。特别是作为体制之外的民办女教师, 一次次直面社会潮流的冲击, 一次次体会无奈和无力, 甚至有些人采取了更多的隐忍和自我“出世”的人生哲学来应对打击, 逐渐形成宿命色彩的人生观。

四、第三代乡村女教师: 革命与文明的传播者

“文化大革命”的到来, 使得乡村教育事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混乱和破坏, “读书无用论”的不良风气蔓延, 乡村教师成为“臭老九”^[7], 至此, 乡村知识男性开始思考自己的前途与命运, 相继逃离“教师”这一岗位。第三代乡村女教师渐次补进, 造成建国后第一次教师队伍男女性别比的趋同趋势。以河北省青龙县为例, 在1966—1968这三年, 即政治运动最激烈的三年里, 该县教师总体数量呈现下降的趋势, 但女教师人数仍旧逐年增加(见图1)。

与此同时, 不得不提由于大批知识青年下乡, 其中部分女青年也补充到乡村教师的岗位上, 在政治运动的既有规定下, 因为缺乏其他出路, 知青女教师更快地融入了当地的教育, 融入了当地的生活^[8]。而对知识分子缺乏的乡村教育而言, 这些年轻的知青女教师无疑似一股“清流”, 注入了乡村和学校, 为村民和学生带来了城市文明和福音, 使现代城市精神和市民生活也首次影响到了乡土村落, 改变了乡民若干风俗习惯之外, 也为乡村学童开启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笔者在河北省秦皇岛市访谈到一位事业单位干部张某, 他曾是青龙县人士, “文革”期间

他只有十岁,在他家住着一位知青女教师,张某受这位女教师影响很大,最终成为张家第一位

走出去的大学生。张某回忆了当年追随知青女教师们学习的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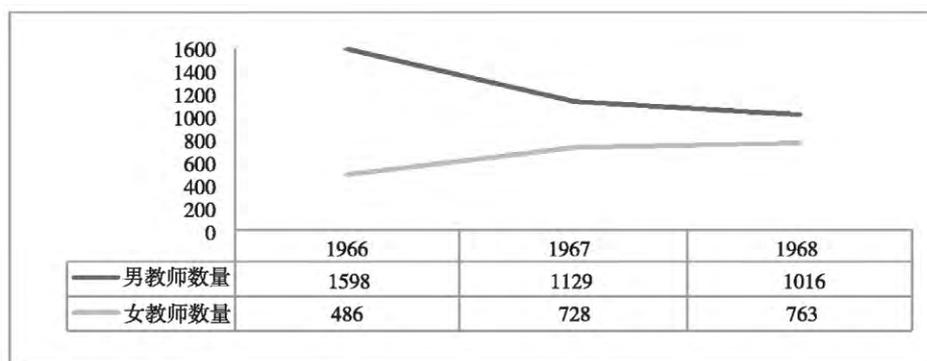


图1 河北省青龙县小学教师分性别统计人数(1966—1968)

1968年秋,我们村来了第一批知青,都是北京来的,个个都拿着《毛主席语录》,是用马车把他们从大队拉回村的。总共6个人,3男3女,都被分配到农户家吃住。孙老师是村里安排她暂住在我们家的,马老师住隔壁我婶子家。自从家里多了两个这城里的女老师,我们可稀罕(喜欢)了,两个年轻的女老师每天都笑嘻嘻的,说话声音特别好听的不得了,又干净又漂亮,而且她们能写会画,会唱歌弹琴,孙老师笛子吹得好,每天都有一群的小孩子都围着她,跟她学吹笛子,学唱歌;马老师年纪更小,也就是十六七(岁),爱唱爱跳,玩儿起来比我们还欢实(高兴),带着我们学唱用毛主席诗词谱写的歌曲,还有城里人唱的儿歌。孙老师是个大学生,比马老师沉稳些,她就爱坐在太阳地里看书,我后来也跟着翻她带来的书,有《烈火金刚》、《卓亚和苏拉的故事》啥的,那是我第一次看小说,好看了,还有一些外国文的书,我当时看不懂。后来,1969年春,又来了4个北京的知青,村里给他们三间房,算是个宿舍吧。我最尊敬的就是孙老师,孙老师有学问,啥都懂,她还教我英文,给我起了个外国名字叫Joe,我现在还没忘了呢!说句实话,我们这群乡下孩子第一次开眼,就是他们。那时年纪小,不懂得啥运动,但他们一来,村里好热闹,他们经常给我们讲城里的事,啥小汽车啊,啥黑匣子(收音机),还有那外国事儿……我觉得也是因为他

们,我们好多乡下孩子在他们走后都立志要好好读书,也想进城里看一看,过一过城里的生活……这种影响,对我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

五、第四代乡村女教师:全科型的精英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的发展促使教育体制改革,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目标之一就是“普九”(全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为了实现“普九”目标,以及弥补师资不足,国家开始加大中等师范教育的兴办和改革力度。中师教育的中心任务就是培养小学教师,而且是普师、音乐、美术、幼师并驾齐驱^[9]。中师对于乡村学生来说在当时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特别是女生,它意味着可以实现“农转非农”,成为“公家人”。笔者2012年在贵州省威宁县调研时遇见一位曾经中师毕业的女教师王某(36岁),问及她当初为何选择中师而不是其他学校时,她说:

初中毕业时,我们班学习好的女生的去向就是中师和卫校,主要是家里穷,想早点毕业领工资,那时候初中毕业考中师不容易的,都要学习成绩拔尖的,学校分数可高了,比升高中还难,我们一个学校才考上5个中专的女生,3个师范,2个卫校。

中师当时在招生上的吸引人之处一方面在

于乡村女生“跳龙门”的机会是非常有限的,而对于上世纪80年代的乡村学生,相比其他专业,中师招收名额较多,并且其他专业就业取向也不如中师明朗;另一方面,在乡村,人们对于教师比起其他职业还是怀有敬意和好感,认为这是女孩子最佳的选择。上世纪80年代的中师教育不仅给乡村读书的女生一种满足和成就感,也给了她们对未来“吃皇粮”的期待,更有

一些现实的支持,这对于贫困家庭出身的学业成绩优秀的女孩及其家庭而言,都是极好的。

对于这一代乡村女教师还有个明显的特征,她们可以说是乡村教育中最后的“精英”,由于选拔机制严格,以及国家对“各地中等师范学校应针对乡村发展的需要培养合格教师”的强调,中师教育为乡村学校培养了一批全科型教师(见表1)。

表1 河北省唐山师院课程表(1990)

课程类型	具体科目	备注
基础课	政治、语文、数学	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
专业课	教育学、心理学、音乐、美术、体育、各科教学法	
其他知识课	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历史	扩展性课程,不考试
技能课	电教、书法、计算机操作	根据小学教学实际需要开设

笔者在河北省张家口崇礼县调研时,当地村民对中师教师的评价普遍高于之后的本科生,据当地一位老校长称:

中师生可以说是我们乡村最后的一批“精英”,那时候考中专比考高中分儿还高,这帮女娃娃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学习(刻苦),考上了师范不容易,读上三年就能回来给家里添钱了,她们心里有底,^①人家学得也扎实,主科副科都能拿得上手,对乡村的小学校来说请不来那么齐全的老师,这些女娃娃们啥课都能上,音体美都行,个个了不起,我们就需要这样的孩子;而且她们不像现在来的大学生,总想往外走,她们知道自己的文凭不高,也就乐意在乡村学校奉献,从不讲究啥,干得好啊!

六、第五代乡村女教师:被“甩”出来无奈

世纪之交,我国乡村教师的性别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义务教育阶段女教师数量迅速增长,男教师比例持续下滑。不少县乡甚至是村小,女教师的数量都开始远超男教师。以笔者调研的河北省青龙县县城两所小学为例,2011年—2013年,这两所学校的女教师数高于男

教师数倍(见表2和表3)。

表2 河北省青龙县第一实验小学
(连续三年)教职工性别统计情况表

年度	总人数(人)	女教工(人)	男教工(人)
2011	220	205	15
2012	220	205	15
2013	224	212	12

表3 河北省青龙县第二实验小学(连续三年)
教职工性别统计情况表

年度	总人数(人)	女教工(人)	男教工(人)
2011	104	90	14
2012	114	100	14
2013	130	116	14

从新录用的教师比例来看,该县2002年—2013年这十余年来,小学新任男教师比例呈逐年下降的趋势,新任教师中的女性却逐年增加(见表4)。2002年,小学新任女教师是男教师的近4倍;2008年,新任女教师是男教师近3倍;特别是2010年和2013年两年,在男教师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女教师均有百余名补充。

^①笔者认为老校长说的是这一批中师毕业的女生,她们有着比较清晰的目标,对就业也有着较为客观的认识,因而能够扎根乡村,服务学校和学生。

表4 2002—2013年河北省青龙县小学
新录用教师性别分析

	2002	2008	2010	2013
总数	124	198	46	88
性别结构				
男教师	26	57	-77	-13
女教师	98	151	123	105

随着我国城镇化脚步的加快,以及市场经济全面深入乡村,乡村劳动力的就业状况比上世纪90年代更加广泛,特别是女性外出到城市的务工人员增加。然而,这些外出务工女性,特别是年轻女性虽然并未把在城市中“打工”作为终身职业,但她们返乡之后却不愿意也不能够从事农业生产,乡村提供给妇女就业的机会并不多,在仅有的选择中,教师成为乡村知识女性最为青睐的职业。

笔者在河北省青龙县访谈了一位私立幼儿园负责人陈某美(30岁),她2002年高中毕业后进城打工,2010年返乡,问及她为何回乡,她说:

一个女孩子在外面不容易,在工厂里干活也不比种地轻松,还得瞧人家脸子(脸色),我受不了,而且一个女孩子在外面总不长久。(20)10年以后政策好了,赶上我这几年也攒了点钱,我就找了个同乡一块承包了个旧工厂,一合计我们女人能干啥呢,发挥咱的“长项”哄孩子,就这的,我们姐俩就在镇上办了个幼儿园。

城镇化一方面促进乡村女性劳动力流动,但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的成为“城市人”的种种限制又将出身乡村的女性劳动力推回乡村。在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农村籍女大中专学生成为就业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再加上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歧视,“体制内”的乡村教师工作成为乡村女大学生既爱又恨的无奈选择。

据笔者2012年在贵州省的基层调研发现,从该省贵阳师范院校就业处提供的连续四年“特岗”教师报考情况来看,报考“特岗”教师的学生中女生多于男生,农村户籍学生多于城镇户籍学生^[10]。在对贵阳师范院校一名大四女生访谈时,该女生对于其选择师范专业并将从

事教师职业的态度如下:

我是在找了几轮工作都没有(录用)消息后才打算回去当老师的。家里供我一个大学生不容易,原来我以为自己念了大学后就能够留在城市,结果找工作四处碰壁,后来看见班里不少女生都纷纷回乡当老师了,她们也劝我,我想,想了很长时间,觉得虽然教师工资低,但还是比较有保障的,一个女孩子能有份稳定的工作就算了。

目前,我国乡村教师性别结构已经呈现一定的“女性化”趋势,而这第五代乡村女教师中间有很多人选择从事教师职业都是无奈之举,缺乏应有的生机和活力。再加上这些乡村女教师同时又带有鲜明的乡村妇女的特征,家庭事务的处理和家庭建设在她们的生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相比家庭生活,教师职业的成就感和满足感较低,而且这种低成就感和低成就意识,又会使她们忽视乃至放弃自身提高的可能性,放弃专业能力发展的机会^[11]。

七、结论

乡村教师原本是由在乡村文化和地位相对优越的男性所从事的职业,然而随着共和国政权建设的需要,女性逐渐走进教师队伍并且成为一支稳定、廉价而且积极投入的队伍。随着普及教育的发展和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趋势,越来越多的乡村女童开始接受学校教育,甚至高等教育,又渐次成为就业竞争中溢出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一批人。从建国之后至今笔者梳理的我国乡村女教师的五个代际中的典型群体可以看出,乡村女性进入公共教育视野,最终成为教师,这一“小事件”是与国家政权建设、乡村社会组织变迁、乡村学校教育发展这些“大事件”分不开的,更是国家政权建设的需要,乡村社会与教育变迁的结果。从建国至今,不同年代和历史时期,乡村女教师的来源不同,其教师身份的获得不同,她们对乡村社会以及乡村教育的功能也有所差异,另外,她们自身的精神特质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笔者通过表格的形

式描述了五代乡村教师的典型群体在国家政权 构变迁特征方面的特点(见表5)。
建设的使命、乡村教育特征与乡村教师性别结

表5 我国乡村女教师代际变迁(1949至今)

代际	内容	代际划分 大致时间	典型代际群体特征	国家政权建设使命	乡村教育特征	乡村教师性别 结构特征
第一代	乡村女教师	1949—1956	从业年龄早,身份多样;政治素养合格;通过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和速成培训走上教师岗位;共和国低成本乡村普及教育的生力军。	经历建国、土改、抗美援朝、清匪反霸等革命与政治运动。	配合新生政权的性质和巩固需求;肩负乡村儿童教育和成人识字扫盲教育双重任务。	男教师占绝大多数;旧社会私塾教师与新社会教师并存;女教师极少。
第二代	乡村女教师	1957—1966	教师身份随国家政策不断流动与变化;公办教师严重不足,民办教师补充;经历各种自然与人为灾难,遭受极度饥饿与贫困;经历各种教育运动。	经济生产与教育事业“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巩固调整阶段;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与阶级斗争相结合。	公办教师群体中女性少,民办、临时和代课教师群体中女性多于男性。
第三代	乡村女教师	1967—1977	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师范院校停招,部分城市女青年走上乡村教师岗位;教师地位骤降。	公办教师下放回队,挣工分、吃农村口粮“小学不出队,中学不出片,高中不出社”;批“师道尊严”。	备战备荒;阶级斗争不停,继续革命不断;城市知青带来福音。	女性知识青年充当乡村教师;乡村男性逐渐退出教师队伍。
第四代	乡村女教师	1978—九十年代中后期	全科型的中师生,乡村最后一批精英。	经济体制改革全面铺开,目标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大力发展中等师范教育。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教师已经成为乡村一些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中孩子的选择,尤其是女孩。乡村女教师数量还是渐渐与男教师接近。
第五代	乡村女教师	2000年至今	高考扩招后的受益者,年轻,“80后”,也有部分“90后”。	城镇化加速,市场经济全面深入,信息化、消费主义大行其道。	乡村凋敝,男性外出打工,也有女性进城寻求机会,学校撤并。	乡镇一级中小学女教师占绝大多数,贫困偏远地区的村小女教师难以派驻,难以留任。

第一代乡村女教师得益于新中国利他性的妇女理论,使得政府重视乡村女童的教育,从而也重视对乡村女教师的选拔和培养。这一时期的乡村女教师人数少,身份多样,群体差异性不明显,普遍的政治素养较高,但文化水平较低,

承担着乡村儿童教育和成人扫盲教育的重任。

第二代乡村女教师在共和国跃进和调整政策之中获取和被剥夺教师身份,为了弥补公办教师的不足,民办和临时代课教师出现,这后者多为女性,而且是乡村教师队伍中的“末等公

民”其正式教师的身份的获得异常艰难。

处于“文革”期间的第三代乡村女教师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城市中下放的知识青年,在政治运动的既有规定下,因为缺乏其他出路,女知青更快地融入了当地的教育,而对知识分子缺乏的乡村教育而言,这些年轻的知青女教师为乡村学童们开启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第四代乡村女教师正处于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关键期,也是我国大力发展中等师范教育时期,由于家庭的贫困和对未来就业清晰可见的结果,不少乡村女孩选择通过考取中师而获得教师身份,这也是乡村最后一批精英,她们不仅是全科教师而且热爱教育,踏实肯干。

第五代乡村女教师是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节奏的加快,高等学校扩招,城市和乡村的教育资源配置差异拉大的背景下出现的,这一乡村女大学生群体成为就业市场中的弱势群体,相对于其他职业,体制内的教师工作成为其不得已的“鸡肋”选择,她们虽然在乡村,但并不能构成一支稳定质优的乡村女教师队伍。

参考文献:

- [1] 该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1951—1961 年 [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167.
- [2] 李长娟. 社会性别视角下乡村女教师生涯发展研究 [D]. 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132.
- [3] 武晓伟,郑新蓉. 我国农村中小学教师性别结构的女性化——基于河北、云南、贵州三省的调查分析 [J]. 教师教育研究,2015(3):87.
- [4] 王国明. 社会变迁中的农村教师更迭研究 [D].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3:66.
- [5]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 (1949—1982) [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209.
- [6]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 中国妇女运动重要文献 [Z].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10.
- [7]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 (1949—1982) [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46.
- [8] 刘英杰. 中国教育大事典(1949—1990) [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681—682.
- [9] 赵金坡. 声音与回响——我国农村中师生的历史考察 [D].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1:101.
- [10] 郑新蓉,等. 中国特岗教师蓝皮书 [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2:169.
- [11] 武晓伟,郑新蓉. 我国农村中小学教师性别结构的女性化——基于河北、云南、贵州三省的调查分析 [J]. 教师教育研究,2015(3):89.

责任编辑 周莹洁 英文审校 孟俊一